

□关山

## 清华“改大”，国学先行

1925年，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，直接原因是“改大”，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，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，1925年对于清华来说，正是关键一年。

上世纪20年代，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迅速，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年的几所增长到二十多所。相比之下，资金充裕、生源良好的清华却一直止步“中学”程度，同时清华课程设置西化广受校外舆论诟病。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，梁启超、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，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。

这时，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已在积极推进“改大”。他在《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》里表示：“清华不改大学，则落于人后，不得并驾齐驱。”曹云祥拟定“清华大学”“十八年计划”，并上报外交部请求批准，即用十八年时间把留美预备学校改造建设成四年制大学本科院校。他是从清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谋划的，即他思考到，当庚款用完之后，清华学校将如何维系、生存、发展下去的问题：“无论何种学术，皆须先明其研究之法，然后用之以研究中国问题，凡对于国计民生，有直接关系，或对于世界文化，有间接影响者，皆广集通才，详加研究，待其明白解决，不但国家真得学术之用，即东西两文明之真相，亦可因之而表明。”

1925年9月，清华的大学普通科、研究院国学系开学，至此，清华学校分为三个部分：旧制部、大学普通部、研究院。对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人选，校方将目标锁定为与陈寅恪、汤用彤并称“哈佛三杰”，清华学校最早送出国门的留美学生之一——吴宓。

据说，吴宓上任前曾经向曹校长提出两个要求，一是任命他为研究院主任；二是授予他全权办理事务的权利。曹云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并很快送来聘书，月薪300元，任职一年。

吴宓到任之后，立即投入到各项筹备工作中。1925年9月，他写了一篇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》刊登在《清华周刊》上，文中指出：“研究院之地位为：（一）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（大学院），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；（二）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，乃为全国养成通才硕学。对于教授资格，则认为应具有“通晓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、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、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，与学生以个人接触，亲近讲习之机会，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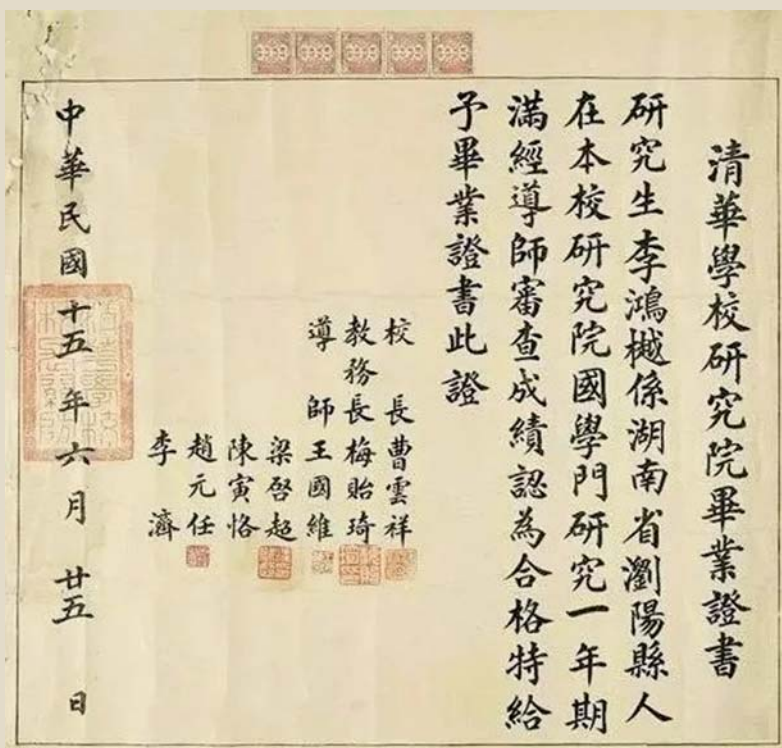
## 杏坛传奇，导师够牛

1925年，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，来到王国维在北京的居所。作风传统的吴宓，见到王国维，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后才说明来意，如此恭敬执礼，令王国维颇为感动，遂同意受聘。10天后，吴宓又到天津拜见梁启超，对方态度是“极乐意前来”。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，他本人亦是清华的“常客”，数次在校演讲，1922年已经在清华兼课，担

# “最牛毕业证”背后——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 杏坛传奇

网上曾热议一张民国十五年的毕业证，其主人叫李鸿樾，“清华学校研究院”毕业。这张毕业证之所以受到关注，是因为证书中签署姓名的有校长曹云祥，教务长梅贻琦，导师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，都是“牛导”，难怪有人称这张毕业证为“史上最牛毕业证”。

1925年至1929年，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短暂存续，却熠熠生辉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号称“清华四大国学导师”，输出近70名毕业生，之后大多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。



▲1927年赵元任改编的话剧公演。  
▲清华国学四大导师梁启超、赵元任、王国维、陈寅恪像。

任国学讲师。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，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“朋友圈”中人。

据说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“四大教授”的称法也是在1925年“流行”起来的。1925年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邀请赵元任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。同年6月，赵元任从欧洲抵达北京，张彭春一见面就跟他提到“四大教授”的称呼。开学后，四大导师的学识和他们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大开眼界。

梁启超先生讲课，不但运用校勘、考证、训诂等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分析古籍的真伪、年代，还经常参考海外学人的观点，一下打开了学生们的眼界。

周传儒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，他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：上课从不迟到，亦不早退，风雨无阻。不说废话，以说明题旨为度。他人已说过的东西，从来不抄袭，不掠美，不诋毁，说话负责，做事负责，是一个地地道道、扎扎实

实的君子。

后来成为楚辞学、敦煌学、语言音韵学家的姜亮夫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。他以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，回忆“他每研究一种学问，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”，故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都能了然于胸，其研究成果的“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根据”。陈寅恪先生强大的语言能力，更令姜亮夫瞠目：“他引的印度文、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，我都不懂，就是英文、法文，我的根底也差。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，我感到非常苦恼。去问他吧，几乎每个字都要问。”

1925年，已举家赴美的赵元任被邀回清华国学学院担任导师。有学者指出，赵元任的角色和当时清华国学学院另外三大导师有所不同——其他三位都研究国学，而赵元任的主业是现代语言学，采用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，这也正是清华所急缺的。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

院，据王力先生回忆：“赵先生所讲中国音韵学是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，和清代音韵学家所讲大不相同。”赵元任先生讲课是站在当代语言学的最前沿，他的讲课有三大特点，一提倡实地调查，二注重古今会通，三致力中西融合。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与研究，赵元任为学校订购语言学仪器，积极筹建实验语音室。

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，这在当时教育界可以说是一项创举，研究院的基本观念，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学。只可惜，战局动荡，风云突变，随着王国维、梁启超两位导师先后离世，曹云祥校长辞职离校，赵元任也赴南京史语所任职，国学院开始由兴盛走向衰落。1929年7月，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，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。1929年6月，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，国学研究院结束。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。

## 学生不多，都不简单

研究院在成立之初，就确立了较高的起点，它“以研究高深学术、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”，聘“宏博精深、学有专长之学者”任教授，学员则从大学毕业和“经史小学有根底”的学生中考试选拔。

从1925年9月至1929年6月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招了四届学生，存续五个年头，录取74人，2人退学，4人病故，共有68人毕业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，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“在中国开风气之先”。

这些毕业生中，有刘盼遂、谢国祯、吴其昌、王力、周传儒、方壮猷、刘节、卫聚贤、蓝文徵、朱芳圃、徐中舒、余永梁、戴家祥、杜钢百、高亨、姚明达、刘纪泽、姜亮夫、陆侃如……都是国学方面的大师。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祯，当时名列榜首，师从梁启超、王国维等先生，此后在明清史、文献学、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。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，著有《中国通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《魏晋南北朝史》等专著。

《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》编委会编委佟鸿举介绍说，毕业证书，既是衡量一所高校教学与科研质量高低之依据，也是衡量一所高校培养人才多寡之物证。李鸿樾的《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证书》之所以被称为“史上最牛的毕业证”，是因为清华学校（1928年8月17日改名国立清华大学）的毕业证书留存下来的尚且稀少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证书更是凤毛麟角。

李鸿樾（1896—1974），湖南浏阳三口筱墅村人。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。他在王国维指导下，再加上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等人的栽培，仅用一年的时间，就出色地完成了《古文字学》课题的研究，于1926年6月毕业。毕业后，先后在湖南省立一中、楚怡高级工业学校、浏阳中学、浏阳简易乡村师范等学校当教员和校长。

李鸿樾长长的人生履历，也是一部浏阳的教育史。在浏阳县立中学执教期间，不少学生交不出书籍伙食费，他均慷慨解囊。从1939年起，他先后出任浏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、浏阳狮子山中学校长。抗战期间，浏阳简易乡村师范为避战乱，几经辗转，那时候缺粮缺钱，没有教材，他就自己编写、刻印，没有颜料就自制颜料。经济拮据时，不善于跟人打交道的“老学究”却四处奔忙为学生筹钱。

冯友兰曾总结：“到了20年代，清华学校的人们，在校内自动改制，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，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，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，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：学术第一，讲学自由，兼容并包。”在那个年代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吸纳顶尖的师资力量，结合中国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，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，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。